

由《左傳》、《國語》看《史記》人物形象的特出

以吳越爭霸相關人物為例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太史公寫作《史記》伊始，二千年來，由於作者司馬遷自身傳奇般的人生遭遇和恢宏的治史抱負，使得這部鉅著始終煥發著不平凡的璀璨光彩，也因此吸引了古今中外無數愛好及研究者的目光；更因《史記》本身內容的豐富多元，從而使研究《史記》的道路廓然分有史學及文學兩大方向。前人謂「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除了肯定《史記》史學方面的成就之外，更對其突出的文學表現給予高度評價。無怪乎劉大杰氏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特闢一章專講述「司馬遷及漢代散文」，將《史記》一書位列於正統文學發展脈絡中至為關鍵的一環。

的確，若細論《史記》對後代文學所產生的影響，可謂有眾多方面：散文則前有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力倡，後有繼於明代歸有光，乃至清桐城、陽湖派的實踐；而唐宋以降之傳奇、演義更繼承了《史記》的史傳文學精神，故對於小說之影響也是不言可喻。而從《史記》當中許多動人而張力十足的故事加以改編的戲曲雜劇等更是不勝枚舉，其對我國戲劇題材的沾溉亦相當深遠。因此，身為歷史學家的司馬遷無疑已在我國文學史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所以劉大杰氏推崇其為「偉大的歷史家，同時也是傑出的散文家，優秀的史傳文學家。」¹誠為的論。

《史記》濃厚的文學色彩固然令人著迷，然而光是探究《史記》的文學價值

¹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華正書局，民國80年，頁163。

而忽略其為史書的身分實在有其侷限性；但倘若只從史學的角度來看待《史記》卻又難免有遺珠之憾。畢竟《史記》是司馬遷用盡一生心力的力作。研究《史記》，我們當然可以透過作家的生平來了解它，相反地，我們也可以經由作品，更深一層地接觸到作家內在的聲音，潛在的意識。故較佳的觀照，必先對作品有充分的認識與了解，深入地探究其表現技巧與創作精神，從而挖掘出作者自身的投射。

自東漢王允以降，歷代多有將《史記》視為「謗書」之論；而班固又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²。由是觀之，司馬遷寫作《史記》似乃為一己發憤之需。然則《史記》之立論行文果有如此偏頗之憾？為了尋求這個問題的解答，除了直接以《史記》「太史公曰」的論贊部分著手之外，整理史料更會是一個重要而可行的方向。故本文意欲從史料整理開始，藉由和《史記》原文作比對、檢視，來看看司馬遷當初在運用這些史料時，是以怎樣的角加以揀擇、又如何鑄裁鍛造人物形象。除了身為一位專業史學家客觀判斷，將史料予以合理的取捨增減外，更希望能另闢蹊徑，看看司馬遷個人的、情感的取捨原則，藉此還原尋找出司馬遷的寫作立場及創作意識，並試圖為這些現象或趨勢提出合理的解釋與分析。

二、文獻檢討

對於《史記》繼承前代典籍，及司馬遷的創作意識、《史記》的寫作技巧、人物形象塑造等問題歷來已多有論述。今僅就各論述方向試舉例一二如下。

（一）關於《史記》繼承前代史籍的研究

韓兆琦在《史記博議》³中提到：《左傳》、《國語》為《史記》提供了春秋時

² 班固：《漢書 司馬遷傳》，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64年，頁1232。

³ 韓兆琦：《史記博議》，臺北：文津出版社，民國84年。

代詳盡的史料，同時《史記》也繼承《左傳》寫人敘事的技巧，尤其在人物心理神情刻畫上又添增上許多；此外，《國語》中一些遠古史事的傳說則為《史記》的相應敘事提供了依據，如 鄭語、楚語 等。另《左傳》、《國語》二書也為司馬遷寫作 吳世家、越世家、伍子胥列傳 等提供了基礎。

顧立三在《司馬遷撰寫史記採用左傳的研究》⁴中則提到：《史記》取捨《左傳》的原則，是以事務對當時政治較有影響者；對戰爭的描述也是以其重要性為標準。如城濮之戰和鄢陵之戰，前者成就了晉之霸主地位，後者僅是續維持住晉的霸業，兩者重要度不能相提並論，故《史記》記敘有詳略之分。而個別國家內史事的篩選則以實際權力為中心，外交部分並不太受司馬遷的重視。

（二）關於司馬遷創作意識的研究

范文芳 司馬遷的創作意識⁵一文中將司馬遷創作《史記》的意識分為七項來討論。第一是秉承父親的遺志；二是職責上的使命感，造就他積極的修史觀。三是對時代批判；四為對人生有所體悟，欲啟發世人。五為司馬遷心有鬱結，故發憤述作；六則是欲立言以求自我之完成。七則是向文學借火，從前人文學作品中得到滋養。

盧敦基 史記中的傳奇心態略論⁶則提到司馬遷在《史記》中慣將題材做激情化、戲劇化、情節化的處理。形式上喜愛描寫戲劇性場面，製造尖銳的矛盾衝突；又如同短篇小說一般，篇幅較小，主題單純，場面集中，敘述精煉。而在心理上則是有英雄心態。如過分誇大辯士之能，把天下事似乎看作一言可決；此外，作者認為司馬遷還有所謂的「清官」心態：把官場看成黑白分明，正邪兩分，結果常是小人得志，造成政治悲劇；再來是復仇心態：以司馬遷特別偏愛描寫如

⁴ 顧立三：《司馬遷撰寫史記採用左傳的研究》，臺北：正中書局，民國69年。

⁵ 范文芳：司馬遷的創作意識，《省立新竹師範專科學校學報》第十一期，民國74年。

⁶ 盧敦基：史記中的傳奇心態略論，《浙江學刊》第六期，1993年。

伍子胥、孫臏、范雎、韓信等人，看出其以文學作為個人復仇雪恥工具的特色。最後作者得到結論乃因為司馬遷受宮刑，故忍辱負重，立志著史，藉文化復仇。故有情緒化傾向，較偏激的觀點也就隨之而生了。

（三）關於《史記》的技巧表現方面

楊松岐 論司馬遷的論斷語言藝術⁷一文將《史記》論斷語言的表現形式分為兩種：有形的是篇前的序，篇後的論，以及篇中的夾論；無形的則分為：一是寓論斷於敘事。如 季布欒布列傳 寫欒布哭祭彭越，借史明義，歌頌欒布重友情恩義，也諷諭高帝的刻薄寡恩。二是用無聲的沉默以寓諷。如 平準書 中的「太史公曰」從歷代說到秦，獨漏漢，正與篇首「漢興，接秦之弊」遙應，以無聲託諷，斥責武帝的好利。三是在人物去留選擇和立篇作傳的對照中以示褒貶。如 酷吏列傳 與 循吏列傳、高祖本紀 與 項羽本紀 等相互對照；另在 衛將軍驃騎列傳 中附了一批將校，並未一一加以列傳，但因司馬遷特別同情李廣，故為李廣另立一傳。四是以爵封和身分標題以示褒貶。淮陰侯列傳、李將軍列傳、魏公子列傳 均以其稱謂稱之，亦可見司馬遷對他們的敬重。

徐興海 史記寫人格⁸一文認為，對人格的揭示是《史記》創作的重要目標。由 報任少卿書 中，作者歸類了修身、愛施、取予、恥辱、立名五項為司馬遷認定的君子人格，⁹並且以「立名」作為整個人格的基礎。作者提到，《史記》中的理想人格以孔子為代表，孔子的語錄在《史記》全書中出現四百多處，故孔子的思想成為《史記》中人格的標尺。作者強調，《史記》中刻畫了多類型的人格：如秦始皇和劉邦均屬於開拓型人格；吳太伯、伯夷則分別為道德型人格。而

⁷ 楊松岐：論司馬遷的論斷語言藝術，《殷都學刊》第二期，1994年。

⁸ 徐興海：史記寫人格，《唐都學刊》第八卷第一期，1992年。

⁹ 報任少卿書：「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引自《文選》，臺北：五南出版社，民國80年，頁1037。

司馬遷更由於推崇李陵，認為其具有孝、信、廉、義、讓、恭儉、又能徇國家之急，故為其辯難；司馬遷本身也為了「立名」，所以能接受宮刑，忍辱偷生，希能有留名千古之日。是故作者得到結論：司馬遷雖以孔子為理想人格，然卻不以儒家的道德型人格去框限歷史人物，而更多地強調歷史人物的歷史地位，及對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所以《史記》揭示人物，評價人物有不同凡俗之點，複雜的人格揭示，表現了司馬遷人格思想的豐富性。

（四）關於《史記》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

何世華在《史記美學論》¹⁰中則談到，《史記》當中描寫人物、刻畫人物的方法有以下幾點尤為見長。第一是擅於在尖銳激烈的矛盾衝突中刻畫人物。如在鴻門宴一段的描寫中，矛盾千頭萬緒，鬥爭時隱時現，尖銳激烈，起伏回環，而各種人物的性格，也於此得到最充分的展現。二是善於選擇典型事例突出人物性格。如 廉頗藺相如列傳 寫藺相如的大智大勇，先公後私的高貴品質，司馬遷便在「完璧歸趙」和「澠池之會」兩段集中表現。三是善於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如晉驪姬陷害太子申生一事，《史記》對驪姬心理活動的刻畫顯然比《左傳》《國語》更為曲折，效果自是更加生動。四是注意行動和細節的描寫。如 孫子吳起列傳 中對孫子作為一個軍事家的才幹氣度，不是靠一般概括性的敘述，而是借助孫子訓諫娘子軍一事來加以展示的。五是採用對比、襯托的手法強化人物性格。如李廣和李蔡， 項羽本紀 和 高祖本紀 等。六是使用個性化的語言表現人物的性格特徵。如最為人所熟知的 陳涉世家 中，陳涉昔日的朋友來看他，見面時「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一語，表現了鄉村農民天真純樸的神情，讀來直是栩栩如生。七是渲染環境氣氛，突出人物形象。如垓下之圍一段，四面楚

¹⁰ 何世華：《史記美學論》，臺北：水牛出版社，民國81年。

歌，充滿扣人心弦的悲壯氣氛，突出了英雄末路的悲劇性格和命運。八是運用寓貶於褒的諷刺手法，揭示人物性格。如在《平津侯主父列傳》中對公孫弘的描寫。透過他漂亮的外衣，極寫他虛偽多計，逢迎拍馬，善於保全自己的本質特徵。

巫淑如在其論文《千姿百態的人物畫卷 - 史記人物形象塑造技法論析》¹¹中同樣也揭示了司馬遷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及取材史料的標準。她對《史記》取材史料的標準看法和陳可青一致。¹²亦即可扼要地歸為：「非天下所以存亡者，故不著」，以及「若是基本史料不及民間神話傳說可靠時，司馬遷便捨史料而就民間傳說與軼事」；再者，《史記》的選材標準又「與立傳主旨有密切的關係」。至於談到司馬遷對史料的改寫部分，她認為司馬遷改寫史料的動機有如下幾點：一是為求真實合理。如《刺客列傳》中將原始史料《戰國策·趙策》中「衣盡出血」一事刪去即是。二是為突顯各篇之中心主旨。如《秦本紀》中將《戰國策》僅以五字交代有關孝公用衛鞅一事，增潤成二百八十個字的文章，即是為了突顯孝公「招賢用能」的主旨所做的改寫。三是為求文字的簡明順暢。如《五帝本紀》中改寫了原始史料《尚書》中相當晦澀艱深的字句；而《左傳》裡也有一些特異筆法及語言難懂之處，司馬遷也一一作了補充，使內容更為連貫有致，清楚明白。四則是為了充分表現人與事的特殊性。也就是，司馬遷在史料的取舍上，往往特別注目於歷史人物能聳動視聽且令人驚奇的特異行為與事蹟。如《楚世家》中選擇將《左傳》原無的楚莊王「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的故事來加以描寫，突顯了太史公有意傳奇人於千秋的做法。五是為表現生動而完整的人物形象。如《伍子胥列傳》中，司馬遷抓住伍子胥的性格特徵，根據《呂氏春秋》、《戰國策》，補寫了伍子胥過昭關，江上遇救，又中道行乞等生動細節，使伍子胥的形象更豐富

¹¹ 巫淑如：《千姿百態的人物畫卷 - 史記人物形象塑造技法論析》，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5年。

¹² 陳可青：《太史公書凡例考論》，《中國史研究》第2期，1982。

且鮮明生動。綜上所論，作者認為：《史記》融裁改寫史料後所達到的文學成就為：1 傳記史料豐富詳實 2 傳記的中心主旨明確 3 傳記的語言文字通俗易懂 4 傳記人物形象鮮明生動，富有藝術感染力。

此外，不能不提及李長之的《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¹³一書。該書系統而全面地由各個角度來探討司馬遷成書的時代背景，學術思想所承；也多方分析了司馬遷的性格對《史記》成書風格的影響，同時對於《史記》內文篇章的結構與文學性，《史記》在文學史上的貢獻與地位俱有深入而精闢的論點，誠可謂思精體大之作。

三、研究範圍、方法

在「歷史」的框架下，《史記》忠於客觀的事實是必然的條件，何況司馬遷的出發點本就在於完成一部優秀的史學著作。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¹⁴、「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¹⁵這是司馬遷對《史記》的期許，文學顯然並非他的主要目的。雖然如此，但是《史記》畢竟是「私修」而非「官修」，故其中有著司馬遷生命熱力的投注與對理想追求的寄託，所以其創作心理和意識勢必牽動整部作品的風格面貌，因此探究《史記》一書的作者創作意識仍屬必要而有價值的工作；此外，在文字敘述的拿捏和對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史記》所運用的技巧和裁度正足以反應作者的意圖。是以應也同樣能抓尋到作者創作心態的圖象。本論文擬藉由探討司馬遷對人物形象的塑造為手段，俾使吾人能逆勢推敲作者的原創動機。為了能做較精確的分析，故將

¹³ 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臺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¹⁴ 《文選 報任少卿書》，頁 1044。

¹⁵ 《史記 太史公自序》，臺北：藝文印書館，頁 1352。

研究範圍縮小，僅設限於春秋末年崛起之吳越兩國，做為論文的目標對象。除了為縮小研究範圍而將焦點集中在吳、越兩國之外，同時另有三點重要的因素促使本論文意欲以吳、越兩國作為探討主題的原因：

(一)《史記》吳太伯世家、越王句踐世家、伍子胥列傳等吳越爭霸相關篇章大抵是依據《左傳》、《國語》二書而成。關於這個趨勢，韓兆琦在《史記博議》一書中已經提及。¹⁶故若要以史料之增補取捨的角度為研究方向，則以吳越兩國作為討論範疇最可見出太史公對於史料增刪的原則，與其中個人對當中人物的愛憎與形象塑造。

(二)《史記》一書鴻篇鉅製，七十列傳中於伍子胥列傳第六而後者共計有六十四篇。而除第七十篇為太史公自序外，所餘六十三篇中但凡與伍子胥、范蠡、大夫種、句踐、吳王夫差等人有關，或曾引其事為論者共有十三篇，計十六處。分別為仲尼弟子列傳一處、張儀列傳一處、范雎蔡澤列傳三處、樂毅列傳一處、魯仲連鄒陽列傳二處、刺客列傳一處、李斯列傳一處、蒙恬列傳一處、淮陰侯列傳一處、韓王信盧縮列傳一處、季布欒布列傳一處、淮南衡山列傳一處，以及貨殖列傳一處。換言之，太史公行文時採吳越爭霸諸事相涉為題材論述者約占列傳的五分之一。若太史公下筆時時援用為例，足見其重要性不容小覷，故而以吳越二國人物為主題探討深具研究價值。

(三)歷來《史記》研究者均注意到後人補竄《史記》的問題。據近人鄭之洪《史記文獻研究》彙整，將之區分為三大類：¹⁷

¹⁶ 見韓兆琦：《史記博議》，史記的繼往與開來 一章，頁235 - 332。

¹⁷ 鄭之洪：《史記文獻研究》，四川：巴蜀書社，1997年，頁190 - 201。

1. 褚少孫補史。即《史記》傳後附有之「褚先生曰」的部分。計有 三代世表、 建元以來諸侯年表、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梁孝王世家、 三王世家、 張丞相列傳、 田叔列傳、 滑稽列傳、 日者列傳、 龜策列傳 共十一篇。
2. 好事者補亡《史記》篇目。即好事者割取成書以補原《史記》之缺。計有 孝武本紀、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禮書、 樂書、 律書 共五篇。
3. 讀《史記》者增竄《史記》篇目內容。即讀史者之備注於傳鈔過程中竄入正文。計有 秦始皇本紀、 樂書、 曆書、 孔子世家、 楚元王世家、 齊悼惠王世家、 屈原賈生列傳、 酈生陸賈列傳、 平津侯主父列傳 及 司馬相如列傳 共九篇。

綜合以上所述，則可了解吳越二國所涉篇章及前面提及所引條項俱無後人竄入之虞，因此出於史公筆下殆無疑義。故以此為研究主題則可避去妄斷之語。

準此，計畫先將《史記》中相關吳越二國君臣的章節挑出，再以人物為主軸，事件為輔翼，從《左傳》及《國語》中擇出有關記載，予以比對分析；同時也將旁搜於現存的漢代或漢以前成書的著作如《吳越春秋》、《越絕書》、《呂氏春秋》等，並思考是否有司馬遷曾參考但如今亡失的資料，藉此釐清司馬遷的取材原則，此其一；其次觀察《史記》是否有異於《左傳》、《國語》二書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呈現獨特突出的設計，以此窺測司馬遷個人的觀點和用意。最後將以漢初社會背景，司馬遷個人學養、人生經歷等多重面向，來為形成這樣的創作意識與心理提出筆者個人的解釋和討論。至於在「人物形象」塑造以外，有關寫作技巧的部分僅提供作為分析司馬遷創作意識的某一面相，因此並非本文論述的重心。

至於何以選用《左傳》《國語》二書作為本文討論的藍本，昔班固有云：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¹⁸

班彪也說：

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¹⁹

又《史記 五帝本紀》亦云：「吾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²⁰由此可以推斷春秋戰國時期的史事，司馬遷的參考底本大概以《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等為主。其中《世本》一書已可謂亡佚，而《戰國策》所述的時間又比本文所欲討論的時代稍晚，所以列入較次要的史料，僅做為旁證之用。

四、預期成果

前人對《史記》人物形象的研究大多在探討「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亦即，其論述重點側重於強調：司馬遷運用了哪些文學技巧以達到成功塑造人物形象的目的，此其一。再者，前人的研究也僅止於從《史記》文本自身中歸納得出司馬

¹⁸班固：《漢書 司馬遷傳》，頁1232。

¹⁹范曄：《後漢書 班彪傳》，引班彪所作《後傳 略論》，臺北：鼎文書局，民國68年，頁355。

²⁰《史記 五帝本紀贊》，臺北：藝文印書館，頁41。

遷在塑造人物形象時慣常使用的表現方法，而忽略了和《史記》關係、淵源都甚為深厚的《左傳》、《國語》二書做一比較。其三，前人所討論的人物形象技法仍僅停留在分析《史記》的「寫作技巧」層面，並未嘗試藉此推求司馬遷「何以如此」的創作心態。故本文將尋前人未盡之處，將《史記》與《左傳》、《國語》以橫向及縱向的比對，如此勢必更能突出司馬遷在塑造人物時所牽涉到的個人意識和創作特點，除了希冀為後人提供一個觀察與研究《史記》的另項思考方向之餘；也期能免於「以管窺天」之譏，而收「見微知著」之效。